

【新闻传播史研究】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历史考察及贡献

余 玉

【摘要】中央苏区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它伴随着革命形势变化而兴衰起伏，约在十年间，其发展历经初兴萌芽、蓬勃发展和衰退尾声三个阶段，表现出出版品类多样、配合中心工作、体现大众特色等显著特征，在发挥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作用、探索因时顺势出版之路、奠定出版管理和经营体制、形成艰苦朴素出版作风以及积累珍贵且有价值史料等方面作出了历史贡献。

【关键词】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历史考察

【作者简介】余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南昌 330031）。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W17107）的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中央苏区是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连成一片的广大区域，“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农民暴动开始，到1937年抗战爆发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前后历时10年之久”^[1]。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工作在这一特定时空下诞生，历经峥嵘岁月逐渐发展起来，它紧紧围绕着革命战争以及巩固和扩大苏区这一中心任务展开，在战火纷飞的环境里开展出版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人民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编辑出版各种报刊和其他出版物，是我国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发展史上的全新创造”^[2]。苏区红色出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业的壮举，是党的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发展脉络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工作的存续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存在时间相吻合，其孕育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农民暴动革命，初兴于1929年初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过程中，1931年苏区中央局建立后蓬勃发展，1934年长征后显出衰退之势，1935年2月中央苏区全部丧失后红色出版业进入尾声，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苏区红色出版事业画上了光荣的句号。

（一）萌芽初兴期（1927年10月—1930年12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强调要重视报刊出版工作：“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于全国……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3]1928年7月第六次党代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在残酷恐怖阻碍口头宣传与鼓动的条件之下，各种形式的刊物宣传（报纸、传单、小册子、宣言等），便获得极重大的意义了。”^[4]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决议案，此后规定红军应出版《时事简报》，传播群众游击斗争和红军工作信息，每周一张以手抄壁报或油印小报形式出版。到1930年，红色出版工作开始步入日常化、规范化，在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及四军前委信中谈及闽西苏区今后的报刊宣传工作，其中规定：“建立经常的出版刊物；建立新闻性质的日常刊物；建立通讯社；党内刊物也要举办；翻印中央、省委出版的各种宣传品及对内教育材料”^[5]。这一系列指示精神催动了红色出版业的孕育，推动了苏区出版业的发展进程。

中央苏区早期出版萌芽于标语、传单和简报等载体中，出版物在萌芽期以简单印制标语、传单和各种宣传品为主，后来有了油印机，出版油印简报、报刊和书籍等，传播载体和形态逐渐丰富起来。同时，在印刷传播之外辅于口语传播的口号、歌谣。简言之，萌芽初兴期的红色出版业的呈现样态起初是标语、传单、各类宣传品、简报等，发展到包括小报、画报、画册、通俗小册子和刊物等各类报刊，再到出版红色书籍，即从单页到多页出版物再到书册式出版物的发展路径。

在中央苏区创建初期，以出版红色报刊为主，涉及少量的书籍出版。在赣南、闽西及其它苏区出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红色报刊，报纸基本上是各地机关报，代表性的有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闽西特委所办同名机关报《红旗日报》、中共赣西南特委和中共福建省委以及中共安远县委所办同名机关报《红旗》、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等。除赣南、闽西地区外，其它苏区也办有机关报，如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报》，湘赣苏区的《湘赣红旗》，湘鄂赣苏区的《工农会》，湘鄂西的《红旗日报》《工农日报》等。此外，苏区还出版了《火山》《锋芒》《布尔什维克生活》《烈火》《浪花》《斧头和镰刀》等。这一时期的刊物主要有中共江西省委内部通讯刊物《省委通讯》和《省委通讯副刊》、赣南总行委刊物《东河通讯》、闽西列宁师范刊物《晨光》、福建闽西总行委文化委员会刊物《我们的生活》等。这批出版物对早期苏区革命起到了鼓动作用，表征苏区红色出版业已初兴，这些尝试性的报刊实践为后来开拓红色出版事业起到奠基作用。

（二）蓬勃发展期（1931年1月—1934年9月）

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苏区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色出版事业也随之迎来发展契机。同年4月通过的《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必须用种种方法在各乡村各城市创办当地的小报；必须编辑各种最通俗的小册子”，同时还强调“在各苏区必须建立出版部，专司印刷与发行的工作”^[6]。1931年春，在福建长汀创办的闽西列宁书局，承担了苏区印刷出版的重任，其机构设置较为全面，印刷、编辑、发行、财务一体化，包括印刷所、编辑部、发行部、会计科和事务股等部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苏区红色出版工作日臻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出版网络构筑起庞大的出版系统，苏区出版事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红色出版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自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瑞金后，中央苏区出版工作进一步完善，不仅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人员，还提出了相对成熟的工作措施。同年3月，随着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斗争获胜，中央苏区进入大发展时期，红色出版事业乘势迅速发展，中央、省、县以下地区的红色出版物几乎在中央苏区全覆盖，不仅报刊增多，出版条件也得到改善，造纸厂、印刷厂、发行单位逐步增多，改变了出版初期时材料紧缺、印刷条件困难的局面，印刷质量有了提高。

据统计，蓬勃发展期新出版报刊达155种，占中央苏区报刊总数223种的66.5%。自1931年7月创刊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报《青年实话》和1931年12月创办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后，中央苏区相继创办了一批红色报刊，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1931年12月创刊）、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1932年2月创刊）、全国总工会机关报《苏区工人》（1932年5月创刊）、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3年2月创刊）、中央理论机关报《布尔什维克》（1934年7月创刊）等都是苏区重要报刊。这一时期的书籍出版也大大发展，到1934年，中央苏区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教育部、中央出版局等中央部门出版图书达450余种，其中关于马列经典著作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概论》，党建方面的《新党员训练大纲》，政权建设的《苏维埃政权》，法律法规的《土地法》《苏维埃组织法》，军队建设的《战术与战略》，文化教育的《士兵识字课本》《世界革命简史》，文学艺术的《革命领袖传略》，医药卫生的《实用外科手术》《中药之研究》等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三）衰退尾声期（1934年10月—1937年7月）

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节节失利，苏区进入最艰难时期，主力红军撤出苏区进行突围转移，而留守苏区的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中央苏区的党、政、军等领导机关被迫撤离，苏区的各大报刊不得不停刊，出版印刷机构也被迫停业，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进入衰退期。

主力红军长征开始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在大批报刊停刊的情况下，而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曾在苏区继续不定期出版了一段时间，“当做一盏光芒万丈明灯，直指向中华民族解放，中国社会解放的苏维埃大道”^[7]，为苏区游击战助威呐喊，直至1935年2月，在战争环境极度危困的情况下结束了

在江西苏区的办报历程。红军到达陕北后，该报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复刊，直到1937年1月改为《新中华报》，成为陕甘宁边区机关报。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坚持出版多期，成为长征红军和指战员的伴侣，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极为难得的是，1934年1月在瑞金创刊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铁锤》，跟随红军坚持在战斗中坚持出版，写下辉煌篇章。

中央苏区于1935年2月完全丧失，苏区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留守的红军部队不得不转入游击战争，在游击区留守红军仍想尽一切办法坚持出版报刊，这一期间还新创一些报刊，如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创办《工农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创办《捷报》，杭代军政委员会创办《红球报》等，它们的创刊是白色恐怖环境里的点点星火，鼓舞战士顽强抗敌不气馁，为游击区民众助阵。直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央苏区的红色出版事业结束其长达十年之

久的光荣历程。

二、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特征

（一）出版数量可观、品类多样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是苏区革命中一支强大的“方面军”，伴随革命事业兴衰发展，自早期简单印制标语、传单、简报及各类宣传品，后来在烽火岁月里出版了大量的报刊和图书，不仅数量大，而且品类全。但战争期间大量的出版物佚散无存，从目前现存的实物和史料记载情况分析，约略可知中央苏区的总体出版状况。从出版数量上看，根据严帆所著《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和程沅所著《江西苏区新闻史》提供的线索，现存中央苏区所出版报刊和图书共680余种，其中报刊223种，图书458种（见表1、表2）。

表1 中央苏区报刊出版情况统计

创刊(年)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不祥	合计
报刊(种)	2	4	10	30	30	64	42	19	4	3	15	223
所占比(%)	0.9	1.8	4.5	13.5	13.5	28.7	18.9	8.5	1.8	1.3	6.5	100

表2 中央苏区图书出版情况统计

品类	马列著作	毛泽东著作	党政建设	法律法规	军事建设	文化教育	文学艺术	医药卫生	布告宣传品	地图	合计
种数	20	6	107	40	59	88	55	48	27	8	458
占比	4.4	1.3	23.4	8.7	12.8	19.2	12	10.5	5.9	1.8	100

从出版品类来看，报刊出版系统有中央、省和县以下各类机关报刊，其中中央报刊系统包括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刊，临时中央政府及所属部门机关报刊，中央军委、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与野战军机关报刊和中央群众团体机关报刊等；省级报刊系统包括中共各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和主力部队、群众团体的省级机构出版的报刊；县及报刊系统包括中共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县赤卫军、群众团体的县级机构出版的报刊；此外还有各类画报画册、小报、宣传小册子等，其中以1930—1933年创刊的报刊最集中，品类多样，四年共达到166种（见表1），在中央苏区编制了一张报刊出版网络。图书出版系统包括马克思与列宁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党、政、群众团体建设书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如法律法规、军队建设、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等书籍，此外还出版许多大众普及读物和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各种布告类宣传品，以及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各苏区地图

和战区地图等，其中党政建设和文化教育类书籍所占比重最大，前者出版107种，后者出版88种，分别占图书出版总数的23.4%和19.2%（见表2）。多种品类的报刊和书籍极大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精神渴求，不但大幅提升了苏区军民文化水平，推动了中央苏区文化事业发展，而且大大提高了军民的思想觉悟，有效推进了革命发展进程。

（二）配合中心工作

中央苏区的红色出版工作是紧密配合革命战争需要开展起来的。中央苏区的开辟和保卫始终与战争相伴，尤其自1930年起，国民党对这片红色区域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反“围剿”期间，红色报刊随战争情势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从1930—1933年四年间共创办报刊166家，占整个中央苏区报刊总数223家的74.4%，其中1930和1931年各新创报刊30家，1932年达64家，1933年新创42家（见表1）。不言而喻，苏区红色报刊适时出版，其重要使命是唤醒苏区军民的革命

觉悟，鼓舞他们的革命斗志，沉重打击和瓦解敌人的嚣张气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因此，苏区红色出版事业的鲜明特征之一是紧密配合苏区革命战争中心任务，即围绕开拓、保卫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这一政治目标展开出版工作，可见，苏区革命战争需要是红色报刊赖以生存的基础。

中央苏区红色报刊都是在斗争的关键时候创刊，它们都有旗帜鲜明的报刊使命，而且都有清醒的为中心工作的服务意识。《红色中华》发刊词鲜明地指出：“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8]《青年实话》针对宣传报道工作强调：“一切题材，应围绕着当时党与团的政治任务做中心，不要机械的分栏。”^[9]这些红色报刊宣传随革命形势发展，在革命运动、战事报道、扩红支前、经济建设、优待军属、瓦解敌军、推销公债、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报道，提高军民的思想意识和觉悟，最终为革命扫清障碍、为军民鼓舞士气，夺取革命胜利。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书籍的选择、编译和出版也充分考虑到苏区战争的需要，马列著作的选译，党建、军事、法律、文化教育书籍的出版都围绕苏区工作的中心任务展开，不仅给大众普及知识，而且为巩固红色政权服务。

（三）体现大众特色

中央苏区出版工作一向重视出版物的通俗化和群众性，这在苏区党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多有强调。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报纸的文字、内容、价格要十分适合广大群众的能力、程度，……发行供给城市与乡村用的大批通俗的政治书籍报章，注意程度浅劣的工农，最好编成歌谣韵语”^[10]。1932年，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更为明确提出：“各种宣传品须力求通俗，不要用深奥难解的文句，须用带地方性的白话语，篇幅不要太长，须力求简短，字句同样不要太长了，要带鼓动性。”^[11]苏区出版工作以此为指引，结合苏区偏僻农村的传播特点，出版报刊和书籍时常考虑民众的接受水平和阅读习惯，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出版物传播革命思想。红色报刊善于抓住群众最切身、最迫切的生动事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百姓喜爱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红色中华》《红星报》《青年实话》等报刊专栏生动活泼，尤其注重以生动、大众化语言和活泼而有感情的报道方式报道新闻，如《红色中华》

常用插图、连环画和画报等视觉冲击性强的图文并茂形式进行宣传报道，很受军民青睐，对此，《红色中华》第232期还刊登专文介绍这一宣传方法：“画报讲演的图画要着色，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画报的内容要浅显通俗化，群众易于看懂……”^[12]，依此提倡画报的大众化。

出版译著和各类书籍充分考虑到苏区军民的文化水平和民众喜好，以提高思想觉悟和普及民众知识为导向进行选译、选编和出版红色书籍及大众读物，带有普及知识、传播文化特性的法律法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医药卫生类的书籍同样考虑民众需求和接受水平，如《土地法》《苏维埃教育法规》《识字课本》《工农读本》《农业常识》《革命纪念故事》《革命歌谣集》《医学常识》《常见病的疗法》《生理卫生常识》等大众读物为苏区民众广为传阅。总之，中央苏区报刊和图书出版从苏区实际出发，尽量适应苏区军民的愿望、爱好和文化水平，使出版物能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三、中央苏区红色出版的历史贡献

虽然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在中国出版长河中只有一段短暂岁月，但它无疑是我国出版史上一朵晶莹浪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其在战争年代发挥了特殊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发挥了信息传播与组织动员作用

中央苏区的红色传播媒介通过大量、及时的信息传播起到沟通内外、连接上下的作用，当时出版的党政报刊、红军报刊、马列经典、红色图书对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鼓舞红军将士夺取胜利，开展经济动员和发展党的事业等方面发挥了凝聚力量、团结人心、鼓舞士气、引导舆论的作用。

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红军报》《斗争》《青年实话》等大批红色报刊积极配合苏区中心工作，在组织和动员军民参与革命和苏区建设及反对国民党发动的军事“围剿”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那些大批反映人民英勇斗争的社论，一篇篇来自战斗一线的消息和战地通讯成为鼓舞军民的强心剂；一份份扎实的实地调查报告，如毛泽东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不但凸显了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而且为军民了解实情、提高认识提供了蓝本。报刊在宣传报道大规模扩大红军时，出现父送子、妻送郎的感人画面；号召广大民众捐助物资支援前线时，报刊成为捐助动员的号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鼓励留

守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极大地鼓动人心；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的红色报刊，成为长征途中的播种机和鼓动器。苏区报刊真正成为沟通内外的信息传播者和连接上下的组织动员者角色，所以李富春在《红色中华》办报百期纪念时高度评价：“它成为党和苏维埃的政策口号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成为党和苏维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战争的有力助手！”^[13]

（二）探索了一条因时应势的红色出版之路

中央苏区红色出版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事业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共产党成立之初，以城市为中心的出版事业占主导，自中央苏区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红色出版事业顺应时势从城市转移农村，自此开启了以乡村为中心的红色出版之路。

1929年8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给永定县委并转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中强调：“各县各区也要尽量办壁报、新闻报，按期出版，分送各地。”^[14]为了适应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多种样态的标语、传单、简报、小报、画报、画册和小册子等非正规出版物在广大农村首先出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满足农村根据地革命动员和文化教育的需要，农村革命根据地纷纷创办各级各类报刊宣传党的主张，出版各类红色书籍传播革命思想，出版大众化通俗读物提高文化水准和普及民众知识。出版物因地制宜、因时应势在广大苏区农村出版，加上共产党还特别重视根据地的书报发行工作，庞大的发行网在苏区农村建立，这些正规和非正规红色出版物在农村遍地开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策和军民动态依托不同的传播载体渗透到苏区每一个角落，致使革命政令和军民之声响彻深山地头，传播效果直接而强大。中共早期出版人披荆斩棘，探索出一条适应乡村传播特点的出版新路，为乡村传播树立了典范。

（三）奠定了我国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基础

在苏区烽火岁月中，为了配合苏区中心任务在农村根据地开展出版工作，苏区成立了中央出版局和中央总发行部，并积极探索建立适合乡村特点的出版管理组织架构和发行体系，形成政企合一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集书籍、报刊的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协调发展的经营机制，正是出版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保证了中央苏区出版工作的广泛开展和落到实处。

中央出版局成立于1931年底，是苏区新闻出版机构和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检查、审批报刊、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出版局下设编审部、发行部等部门，朱荣生担任局长兼总发行部长。显然，出版机构既是管理部门，又是经营部门，而主管人员也是身兼管理和经营两职，政企合一的出版管理体制由此确立。中央总发行部成立于1932年4月，是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管理苏区的书刊发行工作，行政与业务两方面结合。为了扩大发行，中央总发行部建立了发行经济责任制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发行措施，对于加强发行工作的管理发挥了作用。

中央苏区图书报刊发行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邮政发行。1932年三四月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颁行了邮政暂行章程，对苏区邮政发行事业的组织、经费、邮件分类与投递发行等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针对组织设置问题，“中央邮政总局之下，各省设立省邮政管理局，各县按地域的宽窄、军事交通的需要与否，分设甲乙两种邮局，县以下的较大市镇或交通要道，则设邮政分局或邮政代办所”^[15]。针对苏区农村山区特点，在每个区乡都设立了邮政所，其作为乡村发行网的载体散落于农村，同时在直属县遍布了“红色书店”“推销代派处”“叫卖队”等，中央苏区红色出版发行网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建起来，苏区发行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为后来的邮政发行工作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和解放后的报刊经营体制中能追溯其根源。

（四）形成了艰苦朴素的出版工作优良作风

中央苏区在国民党严密封锁和“清剿”情势下进行斗争，红色政权下建立的出版事业面临敌人的经济与物资封锁，出版条件极其艰苦，不得不向敌人的封锁进行顽强斗争。出版工作人员在缺油少盐的生活境况下忘我工作，当时印刷纸张等原材料奇缺，印刷设备原始简陋，苏区出版物的印刷基本以油印为主，个别还有木刻和手抄的，瑞金就曾用木板印刷了《共产党宣言》。工作人员努力克服印刷出版上的种种困难，完成红色出版的历史使命，所以曾参与《青年实话》等报刊撰稿工作的老革命家陈丕显在回忆中由衷感慨：“坚持在这条战线上斗争的同志们，也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顽强的毅力，排除万难，灵活机智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封锁，坚持保证各种报刊和读物的出版，并尽快将它送到革命战士和群众手里。”^[16]苏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更是出版工作艰苦奋斗的绝唱，“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

同志更是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17]。正是早期出版人发扬艰苦朴素、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的精神,铸就红色出版事业辉煌成就,形成了人民出版业的优良传统。从此,艰苦朴素的出版作风成为我国出版业宝贵的精神遗产,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初期都赓续了苏区艰苦朴素的出版作风。

(五) 积累了极为丰富、珍贵且有价值的研究史料

品种多样、内容丰富的苏区出版物详细记录了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期一段艰苦奋斗的革命历程,各类标语、传单、简报、报刊和书籍所留存下来的史料极有价值,更何况中央苏区出版事业处于残酷战争时期,大批出版物遭毁坏而失散,这些现存实物和史料更显弥足珍贵,“这些珍藏下来的报刊和出版物,是研究各个苏区建设史、研究红军斗争史、研究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发展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料,也是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教材”^[18]。所以,中央苏区出版积累的宝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 [1] 梅黎明:《解读中央苏区》,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年,第2页。
- [2] 转引自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 [3] 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5页。
- [4]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 [5]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 [6]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45页。
- [7] 《本报一周年的自我批评》,《红色中华》,1932年12月11日第4版。
- [8] 《发刊词》,《红色中华》创刊号,1931年12月11日第1版。
- [9] 《〈青年实话〉的革新计划》,《青年实话》,1933年2月19日第2卷第4号。
- [10]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39页。
- [11] 转引自程芸:《江西苏区新闻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 [12] 戈丽:《宣传鼓动的又一新方式——画报讲演》,《红色中华》,1934年9月11日第4版。
- [13] 李富春:《“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红色中华》1933年8月10日第3版。
- [14]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 [15] 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
- [16] 转引自严帆:《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 [17] 张家康:《瞿秋白的报人生涯》,《文史月刊》,2004年第6期,第8—11页。
- [18] 洪荣华:《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总序第2页。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Red Publishing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Yu Yu

【Abstract】The red publishing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s an early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risen and fallen along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In about ten years, its development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nascent budding, flourishing development and the end of recession. It demonstrat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various types of publications, cooperates with the center, and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 It plays a role i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organization mobilization, explores the way of publishing in time, lays out the publishing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ms a arduous and simple publishing style, and accumulates preciousnes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valua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have made contributions.

【Key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Red Publishing;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